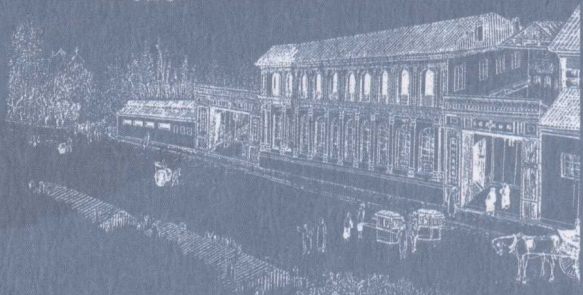




招商局文库·研究丛刊

招商局



黎志刚论

黎志刚 / 著

Li Zhigang's
EXPOSITION
of China Merchants

招商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黎志刚论招商局

LI ZHIGANG'S EXPOSITION OF CHINA MERCHANTS

黎志刚 / 著



招商局文库·研究丛刊



1051001



T10510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志刚论招商局 / 黎志刚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招商局文库·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5097 - 3583 - 1

I. ①黎… II. ①黎… III. ①轮船招商局 - 研究 - 中国
IV. ①F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6417 号

招商局文库·研究丛刊

黎志刚论招商局

著 者 / 黎志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李建军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郭艳萍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251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583 - 1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招商局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胡 政 谢寿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刘兰兮	李亚东	朱荫贵
杨 群	陈争平	易惠莉	武 力
徐秀丽	虞和平	黎志刚	

招商局文库总序

1872年创立的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仅存的硕果，它发展至今天，已成为横跨金融、交通、地产等三大核心产业的企业集团。自创立以来，招商局与祖国共命运，同时代共发展，饱经沧桑，几度挫折，几度辉煌，生生不息，以它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它在自身经营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印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荣辱兴衰，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坐标。招商局史不仅属于招商局，也属于全社会。招商局的发展史，值得学术界不断地探寻和回视。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招商局学”概念，希望学术界努力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学派。可以说，发展和繁荣招商局历史研究，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自20世纪早期开始，不少专家、学者潜心研究，陆续出版、发表了许多有关招商局研究的著述，新观点、新发现层出不穷。继承招商局金字招牌的招商局集团深刻认识到招商局厚重历史的社会意义，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积极组织、投入各方面力量，挖掘招商局百年历史，分别在1992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了招商局历史学术研讨会，在2004年成立了招商局史研究会和设立了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在2005年开设了招商局史研究网，历年出版和赞助出版了多本招商局历史研究书籍，出资拍摄了多部招商局历史题材专题片，鼓励和支持了院校普及招商局历史知识以及培养招商局历史研究人才，派员对散落在各地的招商局文献进行了调查和复制以及购买，定期公开了许多招商局馆藏招商局历史档案。我们不遗余力地做好这些工作，除了推动招商局自身的企业文化

建设外，最重要的是为社会各界研究招商局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社会研究招商局历史服务。

2010年，鉴于招商局历史研究的迫切需要和为了系统化地展示招商局历史研究的著述、文献史料，我们提出了出版“招商局文库”的设想，希望将以前历年来已出版的和今后将出版的有关招商局历史研究书籍以统一的版式集中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我们的这一设想给予了大力支持，对如何建立“招商局文库”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并承担了出版任务。目前，“招商局文库”主要设有“研究丛刊”、“文献丛刊”两个系列。2012年，适逢招商局创立140周年纪念，我们将集中出版一批学术论著和历史文献，以作为“招商局文库”的开篇。今后，“招商局文库”书籍将陆续与大家见面。

希望“招商局文库”书籍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帮助，并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对招商局及招商局历史研究的关注、支持。

招商局集团

2012年1月

“专家论招商局”系列序言

作为创办于1872年的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它厚重的历史，涉及晚清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已经超越企业历史自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包括政治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招商局的独特历史，深受历史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易惠莉在《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编选说明——兼评招商局史的研究》中论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著书立说，圈点评论，对招商局历史的关注与研究从未停止过。他们的研究课题涉及招商局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比较集中的研究在招商局创办的社会政治背景、管理体制、社会作用、收购美商旗昌轮船、齐价合同、局外投资、资金外流、历史人物等方面。

早在1935年就有汤象龙的论文《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发表，1936年又有陈隽如的论文《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发表。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陈振汉为纪念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而撰写了《“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1903）》一文。1963年，汪熙发表了《从轮船招商局看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1964年，邵循正发表了《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论官督商办》。在1963年和1965年，汪敬虞先后发表了《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与邵循正先生商榷》、《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两篇论文。1958年，美国学者费维恺出版了题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的专著，其中对招商局经营活动的探讨占相当大的篇幅。在费维恺之后，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学者在招商局史的

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0 年代中后期以编《海防档》、《矿务档》开始晚清自强运动研究，收集了大量与招商局历史有关的文献档案资料。1962 年，台北学者吕实强发表了《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1970 年美国华人郝延平发表了《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但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美籍华人学者刘广京，他仅在 1959~1962 年间，就著有《19 世纪中国的轮船企业》、《唐廷枢之买办时代》、《中英轮船航运竞争（1873~1885）》、《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等专著和论文。这些论著充分利用了西方在华企业的资料，深受大陆招商局历史研究者的重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对招商局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洋务运动被纳入中国近代史发展进步的进程，招商局成为“洋务运动”正名提供依据的研究对象。各地学者在深入研究洋务运动中，形成了众多有关招商局历史的研究成果。同时，作为招商局自身，也愈加重视招商局历史的研究。招商局集团先后在 1992 年和 2007 年成功举办了两次招商局史学术研讨会，并在 2004 年成立了招商局史研究会，为专家学者研究招商局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从 1979 年起，学术界又出现了众多对招商局历史研究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国内学者如张国辉、聂宝璋、夏东元、朱荫贵、易惠莉、张后铨、虞和平、倪玉平、陈降、陈潮等人，海外华人学者如黎志刚、王尔敏、张灏、陈锦江、徐中约，美国学者庞百腾等，他们的著述直接或间接地对研究招商局的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上述学者当中，朱荫贵、易惠莉、黎志刚和已故刘广京等人对招商局的历史研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他们发表了许多深具学术价值的招商局历史研究文章。但这些文章由于发表时间分散、渠道多样，较难集中反映他们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便于更多的研究者利用、参考。为此，我们一直考虑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向社会和学界介绍。

朱荫贵、易惠莉、黎志刚也是招商局史研究会聘请的首批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朱荫贵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易惠莉 1982 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教授；黎志刚 1982 年毕业于香港新亚

书院，现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广京则在 20 世纪 40 年代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肄业，赴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求学，以后曾长期执教于戴维斯加州大学。

2012 年，适逢招商局创立 140 周年纪念，为支持、鼓励更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工作，也为更好地反映招商局史研究的成果，招商局集团、招商局史研究会正式启动“专家论招商局”系列书籍的出版工作。今年同时出版朱荫贵、易惠莉、黎志刚和刘广京 4 位专家研究招商局历史的论文集，今后将继续出版此类论著。期待这一书系的陆续出版，在促进招商局史研究的同时，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招商局史研究领域，为进一步丰富招商局历史研究的成果，亦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作出更大贡献。

招商局史研究会

2012 年春

序

熊月之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规模大、历时久、变化多的民族企业。对这一企业历史的研究是个大题目，也是个难题目，涉及特广，资料特多，起点特高。政府与企业关系、官员与商人关系、官员与官员关系、商人与商人关系、不同航线的特点及其相互关联、总局与分局的关系、中国公司与外国公司关系，还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头绪纷繁，问题丛集，这些都要研究。资料浩瀚无边，在国内则分散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香港等处，在国外则分散英国、美国、日本等处，相当一部分还堆在图书馆、档案馆的角落里，尘封土埋，没有目录，难于查考。正因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谁都知道轮船招商局课题的价值，但谁都不敢从整体上去碰它，可谓“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只能退而求其次，对它进行局部或片断的探讨。

黎志刚是敢于吃天的第一只老虎。他的博士论文，题目赫然就是《国家和中国第一间公司：轮船招商局》。1993年，这篇论文获得亚历山大·格琴克郎奖，那是美国经济史协会颁给最佳非美国经济史博士论文的奖项。能获此殊荣，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获奖以后，不止一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他的论文，许多朋友不止一次地询问他论文出版情况，我以前每次见他也会问及这方面情况。但从那以后，五年过去，十年过去，近二十年过去了，还是未见其博士论文问世。原因呢，他一会儿说还有某处档案没有看完，一会儿说还有某处码头没有考察过，一会儿说还有某个观点还在推敲。他是论文完美主义者，不到他认为的尽善尽美程度，是不肯拿出来的。

敢于碰硬，可见他的勇气；成果优异，可见他的才气；追求完美，可见他的豪气。

志刚兄是我十分钦佩的学者。他出生于香港，学成于美国，执教于澳洲，先后师从全汉昇、刘广京等著名学者，是刘先生的得意门生。我曾在志刚就读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访问学者，有机会时常向刘广京先生请益。刘先生每次与我说起志刚，总是春风满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说到什么没看到的新书，他总是说志刚会知道；说到什么难查的资料，他总是说去问志刚。在他心目中，志刚是无所不知的百事通，是学术信息的活字典。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志刚兄对于史学研究，早已由好之转入乐之阶段，甚至进入痴迷状态。他多次搬家，从香港到美国，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再从北美到澳洲。每次搬家，都是未搬人，先搬书，未买住房，先买书房。他收藏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业书，一定远远超过昆士兰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每到一处，他的最大乐处就是跑书店、图书馆、档案馆，还有就是与学者交流。每研究一个课题，资料必求穷尽，征引必求周详，论述必求精当。他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头发问题。头发！怎么研究？古今中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无不涉及。他从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美学、文学等不同学科入手，爬梳资料，实地访问，钩稽串联，融会贯通，做出了一篇气势宏阔、学理深邃的大文章。他曾应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演讲关于头发的研究，广征博引，头头是道，真是人人眼中所有，而人人脑中所无，由此可见他过人的史才与史识。

志刚治史有一鲜明的特点，即他对于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情况都很熟悉，没有隔膜。不可否认，哪怕是研究同一个课题，中西学者关注的焦点、进入的路径，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早已被视为明日黄花，不再关心，但是在中国学者这里，还是久谈不衰。原因很简单，各自的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学术语境不一样。志刚生活在西方，又很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现实，也了解中国的历史，可以很自然地做到视野融合，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这种视野融合，让他在中西学术界能游刃有余，见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勤于积累，邃于思考，慎于发表，是志刚的治史境界。此一境界，决定了志刚出手不凡。本书收录的关于轮船招商局的论文，可以说珠玑满篇，卓识纷呈，每一篇都有独特贡献。以首篇《超越家族的信任与合作》而论，这是关于“公司”一词翻译的研究，如果不仔细阅读，望文生义，会以为是对于英文 company 翻译史的交代。但是，细读一过，才发现论文有重要价值。作者以丰富的资料、细密的考订，说明“公司”一词是华人首先创造的，其释义“公共管理”与中国家族文化血肉相连；说明早期在东南亚华侨中的公司与日后在广东的公司内涵有所不同，近代早期的公司与清末公司法颁布以后的公司内涵又有所不同；中国人理解的公司与西方人的公司也有所不同。书中关于清政府与招商局的关系、李鸿章与招商局的关系、招商局国有问题、招商局管理问题等等，均在资料上有突破，论述上有新见，都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志刚兄是我的好朋友，交往近 30 年。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历史所还在徐家汇，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海外来信，收信人写作“熊月之小姐收”，寄信人就是黎志刚。那时，我在做一点关于郭嵩焘的研究，他也在做同样的题目。不知道他从什么途径知道我的单位，又以为名字里有“月”字的人一定是女性，就写了那封信，闹了那个笑话。那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学术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他总是热情相助，问一答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事，得到他许多帮助。他的论文集出版，让我先睹为快。读他的论著，是一大乐事，增知识，长学问，有收益，也会从他的治史境界中，反照出自己的不足。以上这些文字，是我多年读他论著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是为序。

2012 年 3 月 28 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自序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和最有历史连续性的大型企业，它一百四十年光辉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也是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课题。这一论文集是我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研究成果。

1980年我选修了全汉昇老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在课堂上全老师常以盛宣怀和汉冶萍公司作为主要案例。从那时开始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史课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到加州大学的博士论文更以招商局为对象，讨论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发展。此后曾多次到哈佛大学阅读洋行档案，到英国看太古、怡和洋行档案，到南京二档、北京一档、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看盛档，到深圳看招商局档，二十年如一日。我在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的过程中，受全汉昇、刘广京老师及友人科大卫、何汉威、陈锦江、费维恺、高加龙、朱荫贵、戴鞍刚、李培德、林满红、王国斌、William Kirby 的启发最深；在材料收集过程中，得到陈绛老师、冯金牛、宋钻友及盛档工作的友人的鼎力帮助，再次深表谢意。在论文编辑过程中，得到招商局集团和招商局研究会胡政副总裁、李亚东、邱树荣经理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及李建军等编辑的专业帮助，在此一一致谢。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兄在百忙中为本文集作一精辟的序文，使本文集增添了学术智慧，在此深表谢意。为保持历史原貌，对论文本身没有作应有的更动，在日后专著问世时再作补充更正。我以此不成熟的论文集作为对我一直尊敬的轮船招商局创立一百四十年华诞的献礼！

目 录

序	熊月之 / 1
自序	4
超越家族的信任与合伙	
——19 世纪末期对“公司”一词的翻译	汪庆华 译 / 1
清政府与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 ~ 1902）	陈俊仁 译 / 10
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 ~ 1881）	23
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 ~ 1885）	53
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问题（1872 ~ 1901）	82
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金利源码头业权的纠纷	131
自强运动	136
郑观应《易言》	
——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	刘广京 黎志刚 / 158
再访刘广京先生	229

超越家族的信任与合伙

——19 世纪末期对“公司”一词的翻译

汪庆华* 译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公司常常被中国官员用来指称西方的商行。中国的商人也常常把这个词作为他们向国家寻求对发展现代中国企业的支持的讨论基础，比如说郑观应就是如此。

晚清时，股份公司成为把中国传统的企业组织改造成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一转型中最具吸引力的制度模式。虽然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商业组织仍然以家庭作坊与合伙为主要形式，但是模仿西方股份公司的公司已经出现。在本文中，我将对现代中国翻译西方商业知识的过程加以考察。

公司（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公共管理”）在许多字典里定义广泛。^①

* 北京大学法学院 1999 级硕士生。

① 一本荷兰百科全书里给出的公司（kung-ssu）的比较精确的定义是这样的：“公司是一个汉语里的词，它在广泛的意义上指行会、合伙以及社团。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词在群岛地区（荷属东印度）的使用很普遍，后来这个词在荷兰语以及不同的土著语言里都很流行。从字面来说，它的意思是一般大众的管理和公共事务的执行。公司这个词源于 Hakkien 人的方言，他们在爪哇和外围岛屿的其他通商口岸定居。在 Hakka 方言里，它读作 kung - sze。在潮湾和爪哇，商行的执行人通常都被称作 kongsí。中国官员也用这个词。由于中国人对积累资本的手段的不懈的追求，中国的 kongsí 不但在我们的殖民地为数众多，而且在马来群岛、印度尼西亚的外围岛屿以及菲律宾也很多。kongsí 的对中国工业、商业和航运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为了把来自同一国家，同一家族的人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kongsí 得以建立。在家庭 kongsí 中，由于传统的因素，只要其父亲在，没有人能够有私财。所有的家庭资本都由父权处理。无疑，如果进行更仔细的考察的话，许多 kongsí 就不像它们最初看上去的那样是家庭 kongsí 了。但是中国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开始从上面提到的那些起源逐步分化，尤以最近为明显。”参见 T. J. Bezemer, *Beknopte Encyclopaedié van Nederlandsch Oost Indië* (Leiden, 1921), p. 254, 转引自王太鹏，《以加里曼丹岛为蓝本的中国公司起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77 年），第 1~2 页。还可参见 J. L. Viemingjred, “kongsí 和公司”，M. R. Fernado 和 David Bulbeck 编《中国在荷属印度的经济活动》。

其中的一种定义是：“公司是一个中国的关于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通称，它包括从商业合伙到家族和宗教会社直到三合会这样的组织。它意指一类行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类‘公司’，其中一群人投入经济资源，并从企业中获得一份赢利。”^① 虽然公司在 18 世纪的东南亚运用于三合会，也运用于其他的商业组织，^② 但是这些组织不同于 19 世纪中叶中国的公司和合资企业，尽管它们也叫公司。这里使用的“公司”一词，它指的仅仅是 19 世纪中期商业和工业企业这一特殊形式。

在 19 世纪 20 年代，公司常常被中国官员用来指称西方的商行。^③ 据 David Faure 所言，这个词是 19 世纪广东的发明。它起初指的是大约三四十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很快就被借用来指称那些公共的机构，它们以秘密会社闻名于中国人和东南亚的西方人，并从 19 世纪 60 年代始经由大众传媒被引入民族语言。^④ 我同意 Faure 先生的评论。中国的商人也常常把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他们向国家寻求对发展现代中国企业的支持的讨

① 这个定义根据的是 Cd A. Trocki, 《鸦片与帝国：新加坡殖民地的中国人社会，1800 ~ 1910》，康内尔大学出版社，1990，第 11 页。Trocki 还说道：“这个词在汉语里有许多种不同的意思，就和 company 这个词在英语里的情形一样，但是，并不是它们所有的意思都相互对应。而且，和任何一个词语一样，它的意思和用法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公司在 19 世纪的西加里曼丹岛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组织。据 Louise Hankinson 所言，“作为一种组织架构，公司有许多功能。经济上，在中国居民中，公司有利于自愿和资本的积累。每个成员向一个共同的基金的捐助使得中国人能够冒大规模开采金矿的风险。作为对他们的捐助的回报，每个人都被赋予对利润享有同等份额的权利。从政治上来说，公司是一个兄弟政府，其成员平等地参与决策。……从社会来说，公司有利于中国乡村生活向西加里曼丹生活的转变。堂以及公司会所既满足了祠堂的功能，又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起了核心作用，公司为中国的移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提供了保护和积累足够的资金以创造利润回馈中国人的机会。”参见 Louise Hankinson, 《西加里曼丹的中国公司：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没有出版的荣誉学士学位论文，昆士兰大学历史系，1994）第 5 ~ 6 页；还可参见第 20 ~ 32 页。

② 参见 Trocki 《鸦片与帝国》，第 12 页。据王太鹏所言，“18 世纪东南亚出现的公司是这个地区的新兴事物，尽管它植根于中国的合伙以及兄弟会的传统。和中国的兄弟会旨在推翻清王朝不同，公司的起源是和中国在海外的采矿工业的勃兴密切相关的。尽管东南亚的一些公司也实行传统的甚至于天地会的立誓仪式，他们仍然是从小型的合伙，商业的或者采矿业的，发展起来的。”参见王太鹏《公司一词：一个注释》，《亚洲皇家学会马来西亚分会杂志》52：1（1979），第 103 页。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 27、150、160、177、218、222 ~ 223、226、352 页。

④ 参见 Faure 《中国和资本主义》。

论基础，比如说郑观应就是如此。^①

股份公司成为把中国传统的企业组织改造成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一转型中最具吸引力的制度模式。最明显的榜样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IC），根据当时的标准 [在它于 1813 年失去在印度的垄断地位之前]，它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组织，以一种前现代的跨国组织的形式运作”。^② 还有大量的获得特许的公司——比如说，Jardine, Matheson & Co. , Gibb Livingston & Co.,^③ Dent & Co. , ——在南京条约之后把它们贸易活动拓展到了中国。^④ 虽然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商业组织仍然以家庭商行与合伙为主要的形式，但是模仿西方股份公司的公司已经出现。

（西方的）公司，或者说股份公司最初是在同治朝（1862 ~ 1874）的时候引入通商条约的。西方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西方的法律在中国吸收资金获得了成功。^⑤ 这些法律在通商港口经由领事法院以及后来的“混合法院”加以执行。1858 年成立的 Augutine Heard & Company 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公司之一。^⑥ 由美国公司 RHssel and Company 控制的成立于 1862 年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在此后的十年中发展迅猛。^⑦ Russel & Company 是 1824 年在广东成立的一家美国委托商行（American Commission House）。Russel & Company 在上海的

① 具体的例子，参见《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 601 页。

② Jürgen Osterhammel:《英国商业在中国，1860 ~ 1950》，载 R. P. T. Davemport-Hins 和 Geoffrey Jones 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早期股份公司的研究，1600 ~ 1640》，伦敦：1965，第 191 页；K. N. Chaudhuri:《亚洲的贸易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K. N. Chaudhuri:《17、18 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前现代的跨国公司》，载 L. Blusse 和 F. S. Cmastra 编《公司和贸易：旧体制下的海上贸易公司论文集》，莱顿大学出版社，1991；Ann M. Carlos 和 Stephen Nicholas:《早期资本主义的巨人：作为现代跨国公司的特许贸易公司》，《英国历史评论》，第 62 卷（1988 年秋），第 398 ~ 419 页。

③ 参见 Edward LeFevour《晚清中国的西方企业对 Jardine, Matheson & Co. 的一个选择性考察，1842 ~ 1895》，Michael Greenberg:《英国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800 ~ 1842》，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

④ Jürgen Osterhammel:《英国商业》，第 191 页；还可参见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 135 页。

⑤ Faure:《中国和资本主义》，第 38 页。

⑥ 这些机构在“对兄弟行会的传统和经济合伙的结合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参见 Stephen C. Lockwood, Augutine Heard and Company, 1858 ~ 1862: 美国商人在中国（坎布里奇：哈佛东亚研究论丛，1971）；G. C. Allen,《远东经济圈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4）。

⑦ 参见刘广京《英美汽轮船在中国的竞争：1862 ~ 1874》，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